



G224
w67

对 面

——著名播音员主持人访谈录

翁 佳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面/翁佳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3

(语言与传播丛书;1)

ISBN 7-5017-5783-6

I.对… II.翁… III.①广播节目-主持人-生平事迹-中国②电视节目-主持人-生平事迹-中国

IV.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0156号

责任编辑:苏耀彬

个人主页:<http://fbshs.top263.net>

电子信箱:cephs@public.bta.net.cn

联系电话:010-6835-4197

传真电话:010-6835-9421

平面设计:白长江

联系电话:010-6831-9283

对 面

——著名播音员主持人访谈录

翁 佳 著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邮政编码: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A5 12.375印张 190千字

2003年3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6000册

ISBN 7-5017-5783-6/G·1145

定价:28.00元



前 言

蜜蜂变蝴蝶

1998年暑假的某一天，我正在家里挥汗如雨地锻炼身体，鲁景超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是想出一本著名主持人的访谈录，邀我参加采访和写作，当时想也没想，就答应下来。紧张忙碌到了秋天，我们的大作《真话实说》新鲜出炉，书里是15位著名节目主持人的访谈，我写了其中的两个——白岩松和王雪纯。翻开麦黄色的漂亮封面，是张颂老师为我们作的序，题目我特别喜欢——《采得百花成蜜后》。

的确，采访就象采蜜，东瞧西看，问来问去，再去粗取精，经过自己的整理和思考，方能得到最澄澈晶莹的甘甜。不过当时，因为整个暑假都因为忙于书稿而过得不得安生，只觉得采蜜辛苦而没感到劳动的快乐。

后来，于根元先生催我继续采蜜，我就又开始了东瞧西看，左问右问的工作。我是一只懒蜜蜂，总是采采停停，不够勤劳。为什么呢？因为每写一篇文章



都把我这只蜜蜂弄得腰酸腿痛，而又并没有觉得从中获得太大的乐趣。直到有一天——在责任编辑苏耀彬先生告诉我清样已出，在我再度整理这十多万字的书稿时，我飞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回头一看，我眼中的景象不再是孤零零的朵朵鲜花，而是一个流光溢彩的花园，我自己也不再是一只忙得晕头转向的小蜜蜂，而变成了更美丽的生灵（比如说，蝴蝶什么的）——我终于快乐地笑起来。一个写字的人真正获得满足感的一刻就是这样吧——不但写出了作品，而且在这写写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

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在这里向曾与我对面倾谈的12位书中主角真诚地道一声珍重，向一直关心支持我的师长和朋友们深深地道一声感谢，再和您一起来分享这点点滴滴交汇而成的心得吧！

作者

2002年12月



目 录



- 前言**
- 1 **白岩松** 痛与快乐的边缘
- 29 **王雪纯** 浸润在生活中的修炼
- 57 **周 涛** 生命象花一样绽放
- 84 **方 明** 堂堂正正、豪放潇洒
- 112 **张 悦** 一道清清的流水
- 138 **康 辉** 21℃——不多不少，刚刚好
- 173 **李 咏** 性情李咏，香水男人
- 201 **杨 澜** 人生就是活该二字
- 234 **阿 忆** 记忆中曾被看过的味道
- 268 **徐 俐** 耐也耐得烦，扮也扮得蛮
- 291 **张 斌** 喜欢不等于热爱
- 320 **黄健翔** 万喜千忧总是球
- 后记**





白岩松：痛与快乐的边缘

白岩松，生于1968年。198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89~1993年在《中国广播报》工作，1993年加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东方时空》开播以来，一直担任《东方之子》主持人，1996年初《东方时空》改版后任总主持人，现任《时空连线》栏目主持人、制片人。1997年获得全国十佳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曾被评为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和全国十大杰出青年。

我不是一个喜剧的人，骨子里我是比较悲观的，这种悲观是因为看得多了、想得深了。你知道幸福是什么？幸福特别短暂。人生更多的状态是平淡和平淡中的等待。

所有人都可能是黑白混杂而且还有第三种颜色的矛盾体，看看自己，当然也是这样。

——白岩松



AB

血型，让人们不好对付的白岩松在而立之年被评为“九八年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当奖杯被随便地摆在家中的桌角，一层薄薄的灰尘掩住了那镀金的光芒时，他说：“这个奖与其说是给我个人的，不如说是对新闻改革的一种肯定，我幸运地赶上了电视事业急速上升的大气候和《东方时空》的小气候。至于个人的努力，正像某句名言所说，我只不过在幸运来敲门的时候，没有让他去敲隔壁的门罢了。”

白岩松在说这番话时，一如平时在屏幕上那般严肃认真，和他在一起有时会让你感到不自在，但一定不会觉得庸冗乏味。在他把我带进机敏睿智的氛围之前，我抛下早已准备好了的若干话由，提了一个虽然简单平淡，但却发自内心的问题：“为什么你总是那么冷峻，为什么在节目中无论报喜还是报忧，无论谈灾难还是谈幸福你都鲜有笑容？”

白岩松：我有一个准则就是只能做我自己，不可能去模仿别人或做别人。所以做节目时也只能按照生活中和人交流的状态自然地流露。而且，《东方时空》是电视新闻杂志，节目本身是严肃的，当然我在节目



中就更多地展现出自己严肃的一面。我们评论部的一位同事曾开玩笑说，看白岩松的脸，觉得出了大事，再看看崔永元的脸，又觉得没事了，可假如一开始是我做《实话实说》，崔永元做《东方时空》，那么长时间下来，观众对我们俩的形象认知也许是相反的。

每一个人都不会那么简单，人们习惯认定一件事情，觉得它是黑，便认为没有白的成份，觉得它是白，便认为没有黑的成份，其实真实跟这个定义往往相反。一个人特别严肃的时候，也许他内心正溢满柔情，一个人特别幽默、随和、亲切、让人不累的时候，他骨子里也可能有特别多的责任感。正如柴可夫斯基一生没有幸福的家庭也没有孩子，在《悲怆》中，似乎参透了死亡的无奈和人生的艰辛，但他同时又给全世界的儿童写了一部那么喜气洋洋、充满糖果和玩具的《胡桃夹子》。人都是这个样子，是立体的，有很多侧面不为周围的人了解，观众从屏幕上只见到我严肃的一面，看不到我“搞笑”的一面，其实我们评论部90%的娱乐活动都是由我来主持的，别人要讲一个段子，为了追求最好的效果，往往先讲给我听，再由我讲给大伙儿……

但做一个节目给大家形成一个固定印象我觉得挺



好，这说明观众对节目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认同感。但同时，可能大家又总是希望在拥有了这方面的认可之后再得到另一方面的认可，但不可能，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个能让大家都满足的东西。这和办报纸是一样的，我不认为办一个综合类报纸发行量会很大，一个专业类报纸的发行会更好。比如《足球报》，它只吸引球迷，但它的发行量是很多综合类报纸所无法企及的。主持人也一样，我只吸引那些可以被吸引的观众，从来没想过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我，能拥有一部分比较投缘的朋友就已经很幸福了，否则要那么多主持人干什么。

再说到具体的表情，主持人这个行当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在一个短时间内可以评价一个人是亲切还是严肃，是笑还是不笑，但时间长了，这样的评价就会有所变化。人们会看到，你关注的是什么，你关注的角度又是什么。真正的冷漠是对任何事情无动于衷，对喜不喜，对悲不悲，对老百姓的视线没有认同感；真正热情不是外在亲切的笑容，而是确实觉得自己是百姓中的一员，悦百姓所悦，乐百姓所乐，它跟外在的表情我觉得没有多大关系，人们最终会了解主持人面孔背后的真实情感，情感只要是关



切的，表情严肃又有哪些呢？

即使人是有很多侧面的，即使很多侧面是人所不知道的，人们还是能从屏幕上感受到白岩松冷峻背后的激情，和激情背后精神气质的折光。白岩松个性独特，他说，这种个性和所从事的职业无关。

白岩松：做什么职业，做不做主持人，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重要，任何一个职业都不过是跟自己挑战的一个方式。踢足球我也希望踢的最好，喜欢音乐我也希望喜欢到非常专业的地步，做主持人当然也希望做得更好。

任何事情不过是你自己跟自己叫板，否则活着为什么，跟别人叫板没有意思，跟自己叫板才有意思。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跟自己较劲的时候，那另一个自己总是比你高出那么一点，当你已经达到某个高度，那个和你较劲的自己又要比你现在高出一点，这样反反复复，生命就有了意义。心里总有一些希望，一些梦想，它又总会走到现实的前面去，就好像人永远追不上自己的影子一样——对我来说，就是这样，我个性如此。我心中永远有一个战场，永远在给自己



出题，然后自己去解，这已经是思维和行为的习惯了，所以做什么职业对我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但另一方面，我还有很多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做主持人的时候，和职业衔接得更好一些，因此我总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个性中最主要的两个特点，要跟自己较劲和有比较多的社会责任感，做主持人都给了我一种释放的可能。

《东方时空》中的白岩松当然是以兼济天下为已任的，但我没有忘记在这之前他是常常在报纸上写音乐评论的。写音乐评论究竟需要多大的责任感？他说，那时，他就不仅仅想独善其身，而且和现在相比，那时的责任感只多不少。

白岩松：这种责任感是根深蒂固、改变不了的。1991年我在广播报时，就写过一篇评论叫“请为历史留下一点什么”，现在回头一看，我那时的责任感比现在还深。因为现在的状态是你想没有责任感都不可以的，而那时的状态是倘若有责任感是很好笑的。90年代初流行的是王朔的书，流行的是玩，流行的是大家觉得“很累”，把“别理我烦着呐”印在T恤上。



我的那篇文章是写给文人的，主题就是：别太浮躁了。我引用了一句名言来说明文人需要磨难，磨难之后应当有巨作出世，但现在还没有，所以希望大家都能静下来，能跟这个浮躁的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通过你的笔为历史留下一点什么。当然这个观点现在是毫不新鲜了，中学生都在作文里反浮躁，但你看那时候，七年前，没有人给我压责任感，完全是自己主动的，所以这种根本上的东西，即你所拥有的秉性不太会改变。

不少喜欢白岩松的人真诚地欣赏他身上流露出的时代精神守夜人般的责任感和由此而来的沉着慷慨的思辩性，而在探寻这种个性的渊源时，又浪漫主义地认为这是因为他从小生长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蒙族深沉而又执著的血液与生俱来地在他身上流淌……而白岩松自己，对此却另有一番说法。

白岩松：为什么会给自己背负上责任感，这也是我常常思索的问题，要说明这个问题有两套方案，一套方案是我告诉你我来自什么样的家庭，那么仿佛这一切跟它有关。比方说我们家都是搞历史的，而且大



部分是老师，我爸爸妈妈是历史老师，我哥的专业则是更为寂寞的考古，我在教师大院里长大，从小在书香中熏染，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谈历史和责任，慢慢地我也有了铁肩担道义的自觉……这第一套方案在道理上讲得通，符合人们通常认定的规律——家庭环境对人的成长有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其实我不觉得自己对这套方案有多么大的认同感，反而第二套比较模糊的方案更接近我的真实想法——家庭环境和个人成长有关系，但关系没那么大。也许兄弟姐妹几个同样生活在一个家庭里，但出来之后各自的选择却不同，这个家庭为什么没有把他们都塑造成一个样子呢？——还是因为骨子里的东西不一样。要说明性格形成的渊源对我来说确实有些困难，因为很难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了，这条路走得很长啊，走了那么长的路，你很难回忆起来究竟在哪个叉道口给你注入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也很难回忆起来是哪件事情给你那么直接的触动……但形成和现在差不多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包括责任感，还是在大学。

1985~1989年我在大学度过，正好赶上当时的文化热，萨特、尼采、哲学书籍流行，大家都看。虽然当时看那些书是为了拥有一种可炫耀的，和别人谈话



的资本，但毕竟都看了，这是第一；第二，中国新音乐在起步，1986年的“让世界充满爱”，崔健第一次登场让我们很激动。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这批人在上大学的时候浸润了一种强烈的摇滚精神。摇滚其实是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责任感，是不分民族、种族，也不分社会制度的一种背叛，是人本的背叛，是对现状的不满足。真正的摇滚植根于正义和良心，尽管它带有一定的破坏性……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逼着你必须去考虑许多事情，所以我们在大学的四年既不轻松也少风花雪月，是比较严肃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特点，而是整个那一批人的特点，1985~1989年真是跌宕起伏，我们在校园中对国家的关注要比现在的大学生大得多，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一个相信真诚与信念的时代，这个印记深深烙下挥之不去。那段时间的经历和思索对以后影响深远，所有有这段经历的人都会背负着不同的责任感，这是逃脱不掉的。也许这批人现在有的下海做买卖了，貌似只会经商算账，其实可能他只不过觉得面前的事情尚不值得他那么绝对，那么激烈，如果真是碰上一种比较极端的状况，他可能扔下手里的东西比其他人扔下得更快……



白岩松搞音乐评论时，正是中国“新音乐的春天”，轻风扑面，空气新鲜，而现在，面对音乐电视越来越热闹却也越来越缺心眼儿少智慧的闪亮登场，他的感觉是无奈多于可爱。

白岩松：我可能是比较早搞音乐评论的人了，1991年在广播报时写过八篇“中国流行音乐现状”，当时就谈到了唱片制作的工业化和包装、反盗版等许多问题，后来集成了一本十万字的书，但现在中国流行音乐的确不那么值得我们关注了，如果要关注的话，更多的可以关注一些地下乐队。现在的乐队中还是有几个不错的，李杰的东西就非常好，你可以听出那不稳不躁的感觉，挺可爱的；“清醒”也比较可爱，那是一种真正的国际潮流，你可以说它很商业，但商业得好听，不象有的乐队标榜商业却那么地不好听……

谈到这儿，我们不得不说起另一支昙花一现，但却不曾被人淡忘的乐队——《唐朝》。1992年底，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凌空出世，那石破天惊般的声音如同划过夜空的闪电，激荡了无数颗年青的心，后来，这



支乐队分崩离析，至今没有第二张专辑。

白岩松：《唐朝》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时，我一直在棚里，多年以后，再听《唐朝》的东西，还是觉得好。曾经那么优秀的一支乐队，如今烟消云散，让我悲观地看到一点：中国人似乎不太拥有合作精神。大家永远不明白，当几个水平都高的人合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创造出让每个人都得意的结果。当然《唐朝》的解体有很多意外的因素，但有一点让我特别耿耿于怀，那就是仿佛人们只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幸福。身边所有的事似乎都这样，马俊仁和他的兵们，在最艰难的时候，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结果就出成绩了，出了成绩之后，你再看看吧——一锅粥。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在今年上半年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没戏的时候，咬紧牙关拼到第十轮，名列第二，下半年刚略有起色就立刻一塌糊涂，甲A六场比赛，两胜两平两负，然后教练要辞职，足协杯也被淘汰出局……

谈到这儿，我问：“《东方时空》红火了那么长时间了，早已走过了创业期和磨合期，远离了‘共苦’



的日子，你们会不会也有不能‘同甘’的危机？”

白岩松：我们还好，比起其他行业，电视人更需要合作，与其个人出彩，不如达到“共赢”的境界，这除了靠觉悟以外，当然还要有制度的保障。我们的机制比较现代，从起步期起就和旧体制有所不同，人员是流动的，经济收入和你的干劲以及干的结果有关系，让人没法儿吃大锅饭，而且不仅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也不一样。这样的机制再加上良心给自己的加压，就逼得大家很难松劲，大量的直播节目使我们永远没有一个平台可供停留，总是刚走上一个台阶，又有更高的台阶必须去迈，其结果就是：《东方时空》八九年了，还能立住。在中国，一个电视节目能立住五年左右就已经太难得了。而在你不断进步的时候，也在不断培养着观众的挑剔，观众的进步更快。一个好节目刚起步，观众飞快地认可了你，觉得你真棒，但立刻就有了更新的要求，反过来马上就比你还高——从这个意义上说，观众的高胃口是我们给吊起来的，也得由我们来承担责任，这是压力，也是重要的动力。